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审视

张红霞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科学院, 山东 东营 257061)

摘 要: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在他的实践哲学基础上提出的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理论, 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葛兰西认为, 任何社会集团要想获得和维护政治领导权就必须首先占有文化领导权, 而知识分子作为上层建筑的“活动家”, 扮演着使文化合法化即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政治功能, 因此, 属于自己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无产阶级实现其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当代思想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今西方左翼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 葛兰西; 文化领导权; 知识分子;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D093 5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5019(2009)01- 0040- 05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一种指导革命实践的文化战略和政治战略, 它要求在“解构”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他毫不含糊地提出, 无产阶级应当夺取并建立文化领导权, 并在夺取政权之后继续坚持这种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理论贯穿着葛兰西对东方与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战略与文化战略及其关系的深刻思考, 构成了葛兰西总体性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葛兰西指出,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重视精神和道德的改革问题, 必须努力形成人民的、民族的集体意志, 建立人民的、民族的新文化并首先取得文化上的领导权。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不能闭门著述、沉迷于自己的高头讲章, 而应自觉地将自己融入社会和民众之中, 承担起传播某种理念和意识的使命, 积极地扮演好“有机知识分子”角色, 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的角色。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 主要是指一种非暴力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手段, 它是通过被统治阶级的积极“同意”而取得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争夺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新革命观

葛兰西从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出发, 提出了他的以争夺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新革命观。他把国家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 与此相对应, 统治阶级的权力也分为“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他认为, 在无产阶级革命或执政过程中, 掌握文化领导权起着比掌握政治领导权更加重要和根本的作用。因为, “国家一有风吹草动, 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 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1]194}对市民社会的领导即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是构筑统治阶级领导权的根本。因而, “一个社会集团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能够而且必须行使‘领导权’; 以后当它行使权力时, 它成了统治者。但即使牢牢地掌握了权力, 它仍然必须继续‘领导’”。^{[1]317}只有这样, 才能最终获得革命的完全成功。这里的“领导权”指的就是“文化领导权”。可见, 葛兰西通过深刻观察资本主义国

收稿日期: 2008- 10- 10

作者简介: 张红霞(1971~), 女, 山东东营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家的政治现实,敏锐地认识到资产阶级获得、巩固和维持其政权的手段不再仅仅是暴力和强制方式,而是更侧重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引导和操纵,并且在正常时期更多地是依靠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行的文化领导权。因此,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指出:“在严肃地分析资产阶级如何得以通过赞成而不是强制来永久地维持它的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葛兰西有着首创者的功绩。”^[2]

(二)以争得市民社会“同意”为主要掌权方式的新上层建筑理论

葛兰西在把上层建筑分成“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大领域的基础上,把权力的行使分成“强制”和“同意”两种方式,从而建立了关于上层建筑的新理论。葛兰西提出,在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议会等各种强制性机构的政治社会领域,统治阶级主要采取“强制”统治方式;而在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舆论机关等民间和社会组织组成的市民社会内,统治阶级主要采取“同意”方式,即行使“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是占统治地位的集团通过对市民社会各阶层进行说服、教育,使其自觉自愿地接受自己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同意”自己的领导地位的结果。这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统治阶级构筑其领导权的根本。它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也为阐释大众文化提供了一种重要理论方法和理论选择。这个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进行谈判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抵抗与融合的过程,需要领导集团做出一些让步和牺牲才能维持。但这样的谈判和让步是有条件的,即决不可动摇和削弱统治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而且,当发生危机时,在伦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层将失去话语权威,文化领导权就会由强制性国家机器取代。因为,“领导权虽然是伦理的政治的,但它必然同样也是经济的,它的基础必然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关键内核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功能”。^[3]因此,“国家是受强制盔甲保护的领导权”。^[4]

(三)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主要权力实行者的新知识分子观

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作为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中介的拥有一定特殊世界观和有意识的道德观的社会集团,他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和输出者,而且“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同时“服务于‘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或国家’,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上能创造各类科学、哲学、艺术等等,下能管理和宣扬早已存在的、传统的、日益积累的智识财富”。^{[1]7-8}他们一方面在政治社会中直接行使强制性文化统治职能,对对立者给予合法制裁;另一方面又在市民社会中充任文化领导权的主要行使者,在普通民众自觉自愿基础上传播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维护统治阶级对全社会的统治。因此,葛兰西又称其为统治集团的“管家”,他说:“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就是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是没有组织的。”^[5]所以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问题,就是要造就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并通过发挥“有机知识分子”集团在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逐个阵地去夺取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逐步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同意”,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从而最终建立稳固的社会主义政权。他指出,知识分子不仅要拥有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还必须与人民大众相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可见,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在深刻研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分析文化领导权和知识分子在政权运行中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探索出的一种对文化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富有创新性的理论。这在文化问题逐渐显露其独特地位的当代语境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特殊的时代价值。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特点

虽然马克思也曾指出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但它被决定的地位却是主要方面,而葛兰西则赋予意识形态特别重要的地位。葛兰西对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权力与文化领导权之关系的阐释是非常深刻的,这种阐释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不仅注意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关注其思想统治即文化霸权,要求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来制定总体性的革命战略,重视阶级意识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突破了传统政治学对权力关系的狭隘理解,将其延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

(一)文化领导权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总体性和实践性特征

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阐释,有着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平衡规律的深入

理解。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有它自身的惰性,总是滞后于政权的更迭和社会制度的改变。同样的,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一旦形成就具有自身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它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完全抵制政治生活的支配和统治,获得自身在日常生活层面的领导权,在思想意识和精神价值等方面保持统一和连续。即使在政治生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期,市民社会仍然可能维持它的经济生活的持续运转和日常生活的伦理承续。

应该指出的是,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目的是探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革命的道路。由于发达国家的政治结构已变得十分复杂,统治者维持和巩固其政权的手段通常不是依靠政治社会的强制职能,而是市民社会的领导权职能,因此,一个新的历史集团要夺取政权的胜利首先必须获得领导权的胜利,以便从精神文化上吸引并争取广大民众,在取得政权之前夺取“领导权”。不同于作为行使政权之方法的强制性统治,“领导权”不仅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本条件,而且是一种保障以广泛认同为基础的政权稳定性的方法。这种领导权就是文化领导权。国家不仅是政治的,也是伦理的、文化的。作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平衡,它既是一种强制性的统治机器,也是实行强制性统治所需要的思想和手段的领导权。比如,法院具有“消极的教育职能”,而学校则具有“积极的教育职能”,它们都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所谓民间首创性活动也趋向于同一个目的,这些首创性活动形成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文化领导权机构”。^[1]

葛兰西特别提出要深刻认识文化领导权及相关战略、策略问题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他反对把争取文化领导权与直接的经济政治斗争对立起来。从战略意义上看,葛兰西理论思考的终极指向并非文化的、理论的,而是政治的、实践的。对葛兰西来说,“文化领导权”主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它是葛兰西政治战略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其最终指向则是政治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既是总体性革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夺取政治领导权的一种手段。

(二)文化领导权对经济基础的渗透性特点

葛兰西的政治理论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文化的能动作用,强调在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无产阶级进行文化启蒙、思想动员的重要意义,强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首先要掌握文化领导权。他在进行其战略构想的同时,批判了经济主义的各种表达式。在他看来,经济主义“对各种意志表现,对积极行动,对政治和精神的首创所抱的态度是奇怪的,好像它们全不是经济必然性的有机产物,而且——更有甚者——不是唯一的有效的经济表现”。^{[1] 135}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巨大影响,群众的思想意识始终落后于其经济状况,因此,“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因素自动引起的运动会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迟缓下来,会受到阻止,或者甚至会在刹那间被消灭掉。由此就产生了进行有意识的和目的明确的斗争的必要性……必须始终掌握主动权,以便使经济运动摆脱传统政治的桎梏,也就是改变一定力量的政治方向,必须把这种力量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建立新的、团结一致的……历史联盟”。^{[1] 142}

葛兰西明确指出了市民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组成要素,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一同进入了上层建筑领域。他还规定了市民社会的具体内容:市民社会是统治阶级传播意识形态的各种各样民间组织的集合体,从家庭、教会、学校到各种传媒、工商团体等;市民社会的作用就是与政治社会一同来管理国家,政治社会执行“直接统治”职能,市民社会则执行“领导权”职能,是统治集团实施领导权的基础。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相比较,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包括“物质关系的总和”,而是意识形态与文化关系的总和;不是“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而是整个精神和文化生活。在市民社会高度成熟的国家,社会发展到了完整国家阶段,政权形式不仅是专政的更是领导权的,不仅是统治的更是领导的。国家不再是主要依靠强制手段来执行简单的警察职能,在更大程度上它主要通过家庭、学校、教会、各种传媒等民间组织来传播其意识形态,以获得民众对国家政权的更广泛的积极支持与赞同。

葛兰西不仅在多种含义上指称国家,也同样在多种含义上指称市民社会;不仅把市民社会(伦理国家)与政治社会(政治国家)看作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的两种特定形式,视为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也强调“在现实中市民社会与国家是被视为同一的”。^{[1] 133}

作为一位强调总体性的思想家,葛兰西强调关注渗透到民族共同体的一般文化精神中的权力语言,强调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在把夺取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作为夺取国家权力之必要条件的时候,也指出了文化领导权及相关战略问题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无可争议的是:

领导权的前提是要考虑那些行将被领导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要产生一定的妥协的均势,也就是领导集团要做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同样无可争论的是:这种牺牲和这种妥协不能触动基础,因为如果领导权是伦理—政治的,那么它也就不能不是经济的,因而作为它的基础的不能不是领导集团在有决定性的经济活动方面所执行的那种有决定性的职能。”^{[1]135}

(三)知识分子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能动性 and “有机性”特点

与一般观念不同,葛兰西从他的总体性的实践哲学出发,反对以从事脑、体劳动的差别作为认定是否为知识分子的最后标准,而主张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来认识知识分子,分析和确定其社会地位、社会属性,理解和把握其独特的社会职能。葛兰西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任何人都从事着特定的职业活动,最终又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智力活动。这种智力活动归根到底有助于支持或改造一种世界观。其实,行使葛兰西所述的知识分子职能的人才是形成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这种特定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必然来自并代表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是后者利益和世界观的“代理人”。正是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范畴,并认为他们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

然而,传统知识分子并不自觉或不承认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他们自视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力图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显示或保持相对稳定而又“独立”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主要是文化的)连续性,加上科技不发达,从表面看来,这样的人似乎可以超越具体的社会和阶级而独立存在。于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形成一种特殊观念:往往自认为不受其他社会力量的牵制,并且独立于统治集团而自治,在社会空间自由往来。葛兰西指出,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认识和评价,使得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影响,极易呈现唯心主义和社会乌托邦的色彩。葛兰西强调了历史的、文化的连续性,因而深刻地揭示并突出强调了知识分子必然地与某个阶级、某个社会集团相联系的“有机性”。

三、当代语境下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再审视

可以说,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经典论述。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分类中,意识形态是处于第三位的,它直接决定于上层建筑,而最终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而葛兰西则重点论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内部结构,并涉及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不过,他这种精彩而细致的分析,依然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宏观视野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在我们看来,文化批判当然非常必要,也极为重要,但完全抛开经济和政治基础来谈文化问题却不能说是深刻的,因为它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并把文化分析置于其他分析尤其是直接的政治分析、经济分析之上,或以文化分析的泛化来消解政治分析。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这种发展对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左翼注重文化批评而忽视政治、经济的倾向。事实上,当代左翼思想界的文化研究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专业话语”,它只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并只为知识分子所熟悉和运用。这种专业话语不仅把理论与实践,而且把知识分子与大众隔离开来。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体现了一个革命活动家和战略家对政治实践的深刻反思,是一种指导革命实践的文化战略和政治战略,是为“武器的批判”服务的。而在当代西方左翼那里,“文化批判”既非实践的理论,也不是理论的实践,至多是一种远离实践的“批判的武器”,在有些人那里,甚至成为退出政治领域的一个借口。这当然不是说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不关心现实,恰恰相反,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引发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激情。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左翼人士,既无心也无力参与政治。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性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远离实践,而且局限于现实存在的某一方面(即知识分子最熟悉的文化方面),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现实分离开来。这种文化主义转向由于回避对政治的直接关注,并热衷于淡化乃至消解总体性,不仅影响到其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深度,也使其文化批判停留在抽象的话语层面,言论所及仅限于大学校园和学术界。可以认为,他们虽然提供了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话语维度,但这种批判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在席卷西方的后现代思潮中,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自有其独特的理论性格。

对他来说,需要“解构”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而不是一般的文化领导权。他毫不含糊地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夺取并建立文化领导权,并在夺取政权之后继续坚持这种领导权。而在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西方左翼那里,当“领导权”或霸权被纳入后现代视野时,其本身就成了必须解构的对象。因为他们来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就是应用的思想逻辑,因此,任何霸权都是必须解构的“大叙事”。西方左翼试图在一种特别的基础(话语)上对抗权力,把在葛兰西那里既是总体性革命战略之组成部分,又是夺取政治领导权之重要手段的文化战略分离出来,使其取代总体战略。这样一来,他们越来越脱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基础,从而不能在整个社会系统的真实结构中来分析文化问题。理论话语取代政治实践,文化抵抗(其实是话语性的)本身成了目的。

我们不难发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正日益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的一个内在的对话对象。葛兰西是一个强调总体战略的革命家,他虽然重视上层建筑,但并未因此而忽略经济基础。这与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左翼,尤其是以话语对于所有历史过程和历史条件的绝对自主性为基础的、把意识形态话语看作与经济的决定作用和阶级立场无关的自治系统、否认政治实践正是通过生产方式的矩阵效用而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他看来,文化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因为文化斗争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和左翼学者则片面而抽象地发展了葛兰西思想的某些方面,把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从其总体性战略中割裂开来,以文化战略等同于政治战略,进而取代政治战略,最终完成其文化主义转向。这种转向在整体上远离了葛兰西的思想。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代的历史运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加剧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使这一理论的内在价值日渐凸显。支配冷战时期达半世纪之久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指导后冷战时期的“文明冲突”论,无不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争夺控制权,这正是我们重审并重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2]〔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余其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52.
- [3]〔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理论[M].李根芳,周素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61.
- [4]〔意〕葛兰西.葛兰西狱中笔记选(英文版)[M].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出版社,1971:56.
- [5]〔意〕葛兰西.实践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5.
- [6]〔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49.

Contemporary Scrutiny of Gramsci's Theory on Cultural Hegemony

ZHANG Hong-xia

(School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Dongying Shandong 257061)

Abstract Gramsci's theory on cultural hegemony, on the basis of his praxis philosophy, develops Marx's theory on ideology. Gramsci thinks that any social group attempting to obtain political hegemony must first obtain cultural hegemony. As activists in the superstructure, intellectual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cultural hegemony by its legitimization. The proletariats need to cultivate their own intellectuals in order to obtain cultural hegemony. Gramsci's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has great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thoughts and theoretical vision of contemporary leftists in the west.

Key words Gramsci; cultural hegemony; intellectuals; Marxism

责任编辑:杨国平,林哲